

〔晋僧〕法显 著
郭鹏 注译



佛国记注译

佛教文化通俗读物丛书

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

编

佛教文化通俗读物丛书

佛国记注译

【晋僧】法显 著

郭鹏

注译

长春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佛教文化通俗读物丛书
佛 国 记 注 译
郭鹏 江峰 蒙云 注译

责任编辑:王爱宗

封面设计:执 一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199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张:6.25

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14 000

印数:1-6 000 册

ISBN 7-80604-269-5/B·4

定价:5.20 元

序

吴信如

时下，世界佛教历尽沧桑，在行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节因缘下，正有一番振兴的气象。中国出版界出版了许多佛学方面的图书，正是这种新气象的一种表现。一批佛学图书的出版，固然是好事，然而，对于佛教修持来说，文字般若难以与实相般若相比；过“热”乃至“滥”，更未必是好事。经云：“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！”然而，就接引不同根机的学人来说，文字般若自有其导俗之功能，净化心灵之妙用。我们看《佛教文化通俗读物》这套书，就不失为一套品位高雅、导人向上、催人奋进、别具一格的小丛书。本书选择历史上著名高僧、著名人物、重要经典、重要法语集等精心编辑而成，不仅是了解东晋、唐宋时代中国印度人文地理的好教科书，而且是引导读者服膺高僧大德起信趣善、净化心灵的指南针、催化剂。

本套小丛书选材新颖，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。“通俗读物”。贵在广为流通，古今中外，各种根机的人都能得到受用，从中有所补益。这虽然很难，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题标准，也是本丛书的一个特色所在。

本丛书的另一特色是：超于凡俗。“俗”有随缘化导与庸俗、粗劣之分。本丛书是随世问因缘，语言形象、生动，

又思想深邃，富有哲理，即有很强的可读性，又超然脱俗，（当然不能入于庸俗、粗劣之列）像《佛国记》所记载的高僧法显以花甲之年历尽艰险，西行求法，经 30 余国，历 10 多年，在返国途中，漂泊南美洲，不仅是西行求法的大宗教家、大翻译家，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旅行家（比哥伦布早 500 年）。其事迹感人至深，其人格高尚，具有很深的“永久”的感染力。其弘法生涯、惊险经历不仅令人振聋发聩，而且有人文、地理、自然生态多方面的参考价值。这样的不朽著作，当能适应各种不同层次人的阅读需要，引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兴趣，成为长期流行不衰的畅销书。

当然，佛教文化通俗读物，最根本的还在于富于教育、教化意义。首先是对佛陀所揭示的解脱真理的信守奉行。本丛书通过高僧大德的高尚行持、古尊宿法语接引不同根机的人的机缘，以及有关感应、灵验等方面的记叙，对于未闻佛法者建立正确的知解、信乐，已闻者增进信解、乐欲、奉行，都有殊胜功用。

如果我们的读者有更多的人通过这套《佛教文化通俗读物》，达到“信”、“乐”、“行”，对于佛法有正见、正知、正行，那么，不仅是佛教之幸，亦是我们所庄严的社会主义国土之幸，人间净土之幸，世界众生之幸！

1995 年 2 月 16 日

于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

序 言

长期以来，唐僧(玄奘)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，这自然是借助了文学作品《西游记》的神力；而比唐僧取经还早二百多年、行程远于唐僧的晋僧法显取经的事，却很少有人知晓。唐僧取经为人们留下了一部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带回并翻译了许多佛教经典；而法显同样带回了不少佛教典籍，为后世留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描述游历西域、天竺的游记《佛国记》(或名《法显传》)，也就是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书的原典。

玄奘取经时值 29 岁盛年，且有唐皇诏令，沿途国家接待迎送。而法显以 64 岁高龄，邀约同道，决心西进，穿过争战不休的陇西高原，越过“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惟以枯骨为标识”的大沙漠，翻过世界屋脊帕米尔山脉，爬过绝壁上的石梯和悬索；同伴们死的死，走的走，留的留，而他，以坚毅的信念，执著的追求，经历中亚、南亚次大陆等 30 余国，学梵语梵文，漂洋过海，置生死于度外，13 年后，只身满载而归。这种精神，实在令人敬畏，发人奋起。诚如鲁迅先生所言：“中国历史上这许许多多舍身求法的人，

正是中国的脊梁。”把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介绍给广大读者,使之成为今日国民精神的体现、财富和动力,这就是编著这本书的宗旨。

注释、翻译这部伟大作品,其难度是不可想象的,资料缺乏,佛教典籍晦涩难懂,不少佛教术语、典故、人名、地名殊难查核。然而,这种种困难,在法显精神面前,简直就不足挂齿了。

本书以南宋嘉熙三年(1139)安吉州法宝资福寺开雕的《思溪资福藏·法显传》(文学古籍刊行社根据日本藏本影印)为蓝本,参阅其它一些版本及资料,校正了其中的一些讹误。原典无标点、不分段,为便于阅读和检索,进行了标点、分段,并按所经各国、各地及主要活动,分为若干部分和子目;书后附录《高僧传》等文献中法显、宝云、智严等人传记,试绘了法显取经所历路线图。注释中,尽量做到全面、准确,具有资料性、学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,使这部繁难的史著能够雅俗共赏,更广泛地传播。译文采取直译的方法,忠实原典,避免因理解的偏差而损害原意。即使对一些不符合当今语法结构的文句,亦在能理解文意的情况下,保持原典的语言结构。这些变动、编排及翻译方法,也许读者是能答应的。

在成书过程中,受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家骏先生等人的支持指导,特此表示感谢。

郭 鹏

1993年5月于陕西汉中

法显与《佛国记》

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有着许许多多舍身求法、可歌可泣的人物，晋代高僧法显就是其中的一员。他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、佛经翻译家，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域向天竺，然后由海路归国的取经者，也是第一个把梵文经典带回国内并直接翻译成汉文的人，还是第一个用文字记述天竺取经见闻的人。法显对中印交通史，对印度历史地理、佛教、风俗研究，对佛经翻译、佛教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。

法显，生于东晋咸康元年(335)，俗姓龚，平阳郡武阳(今山西省临汾西南襄垣县)人。在他出世前后，他的三个哥哥于童年不幸夭亡，其父母怕再出现厄运，便把三岁的小法显送到附近的佛寺里度为小沙弥，求佛保佑。法显逐渐长大后，越来越笃信佛教，母亲与叔父多次逼他还俗，他都拒绝了。到了二十岁时，便受了大戒，成了和尚。在寺

里，他聪明正直，好学上进，“志行明敏，仪轨整肃”，普遍受人崇敬。

后来，他从山西来到当时佛教很盛的长安研读佛教经典。当时的长安，是后秦姚兴的都城。姚兴于太元十八年(393)称帝后，重视佛教，迎西域龟兹(今新疆库车)名僧鸠摩罗什到长安，演说并翻译佛经。但由于佛经大多无文字记述，属口头传诵辗转记录翻译，错谬极多，残缺不全；况且上层僧侣与官府勾结，欺压下层僧侣；一些僧侣不守佛法，无统一的佛家戒规。法显看到这些情形，十分感慨，便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去求取“真经”。

到后秦弘始元年(399)，时法显已六十四岁，与四位志同道合者，从长安出发，西行求经。首先到了当时争战不休的陇西，西出阳关，进入“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”的大戈壁沙漠，经过鄯善、龟兹等国，又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到达于阗等国。经历三年艰苦跋涉之后，又翻越世界屋脊的葱岭(即今帕米尔高原)。接着，经历六年时间，先后到达陀历、乌苌、宿阿多、犍陀卫、弗楼沙、那竭、罗夷、跋那、毗荼、摩头罗、僧伽施、沙祇、拘萨罗、蓝莫、毗舍离、摩竭提、迦尸、瞻波、多摩梨帝等国。在这些国家里，法显一边瞻仰佛教圣地、圣迹，一边学习梵文梵语，搜集佛教经典、图像，抄录经律，学画佛像。此期间，同行者十一人(由长安出发五人，张掖又增加六人)，冻死、病死二人，中途返回六人，留居二人，最后仅剩法显一人。他矢志不渝，克服艰难困苦，一直向前。

公元409年初冬，法显从多摩梨帝国(今印度加尔各

答)乘坐商人船只,携带大批佛教典籍和佛像,渡海到达师子国(今斯里兰卡),在那里停留抄经两年。411年,法显搭乘一艘商船,返回中国。在海上,遇到狂风恶浪,船漏入水,船上人纷纷把粗重东西扔入大海,法显也将自己随身之物掷入海中,惟死死保护住佛经佛像。船在连阴雨中迷失了方向,随风漂流九十多天,漂到了耶婆提国(今印度尼西亚国爪哇岛)。在那里居留五个月后,又乘船向广州,遇上狂风恶浪,商船迷航。同船人认为是因载了这位和尚不吉利的缘故,要将法显扔入大海,幸遇人阻拦才留得性命。船只迷航,任风浪飘摇,一直漂到长广郡牢山(今山东半岛即墨县崂山)。由牢山登岸时在东晋义熙八年(412)七月十四日。上岸后,受到长广郡守的欢迎接待。413年夏天,法显由长广到建康(今南京)。

法显在建康译经七年,共译出近百万字的经律。刘宋永初三年(422),法显在荆州(今湖北江陵)的一个小佛寺——辛寺里圆寂,时年86岁。

二

据《佛国记》第一、二段载,法显从长安出发时,“与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菟等同契”一道;到张掖后,“与智严、慧简、僧绍、宝云、僧景等相遇,欣于同志,便共夏坐。”由此知,连同法显本人,一行为十人。而后,到乌夷国后,“智严、慧简、慧菟遂返向高昌”,法显等到于阗,此时,文中说:“慧景、道整、慧达先发,向竭叉国”,新出现一人——

慧达。为此，一行则为十一人（连同前往高昌三人）。慧达是由长安出发时的同行者，还是在张掖相遇而同行的，法显未言明。从他（慧达）后来由弗楼沙国与宝云、僧景同路返回秦地这一行为分析，慧达很可能是在张掖相遇而同行的。

法显一行诸人，西行取经，去向如下：

法显：由海路归国；

智严：由乌夷国返回高昌；

慧简：由乌夷国返回高昌；

慧嵬：由乌夷国返回高昌；

慧景：死于小雪山；

僧绍：由于阗国向罽宾；

慧达：由弗楼沙国回秦地；

宝云：由弗楼沙国回秦地；

僧景：由弗楼沙国回秦地；

慧应：在弗楼沙国佛钵寺逝世。

道整：留于巴连弗城。

宋《思溪资福藏》本中言：“慧景应在佛钵寺无常。”而后述过小雪山时，“雪山冬夏积雪，山北阴中过，寒风暴起，人皆噤战，慧景一人不堪复进，口出白沫，语法显云：‘我亦不复活，便可时去，勿得俱死。’于是遂终。”由此可见，前面“慧景应在佛钵寺无常”，实为慧应，“景”字为衍文。

以上十一人，在梁代僧佑所著《出三藏记集》及慧皎《高僧传》中，有传者仅法显、智严、宝云三人；唐道宣的

《续高僧传》中有《释慧达传》，其他人无考。《太平御览·释·异僧》中亦有法显、智严二人之传，但其内容是摘《出三藏记集》中二人传记而成。法显、智严、宝云三人之传，后有《附录》列之，此不赘言。

《续高僧传》中的《释慧达传》载：“慧达姓刘，名宰和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，先不事佛……达后出家，住于文成郡，今慈州东南高平原，即其生地矣。……曾往吴越。”“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，流化将讫，便使西返。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……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。”通篇中未言西行天竺取经之事。推论：(1)此刘宰和(慧达)并非与法显同道之慧达；(2)“曾往吴越”，或为“曾往西域”，因传说而误之。不知孰是。元魏太武太延元年，为公元435年，上距法显始发长安之隆安三年(399)仅36年，以其年岁相较，取经是有可能的。该《传》所言，多虚妄流传故事，故很有可能将“西域”(或“天竺”)误为“吴越”。

慧简，诸《传》无载。据《二十五史补编》中《补宋书艺术志》(清聂崇岐著)载：慧简译经十部：《阎维王五天使者经》一卷、《瞿昙弥记果经》一卷、《长者子六过出家经》一卷、《佛母般泥洹经》一卷、《贫穷老公经》一卷、《懈怠耕者经》一卷、《请宾头卢法》一卷、《善生子经》一卷、《佛涅槃后诸比丘经》一卷、《譬喻经》一卷。

《出三藏记集》中载智严同宝云译经三部：《普耀》、《广博严净》、《四天王》。而《二十五史补编·补宋书艺术志》(聂崇岐撰)载“智严等译”经有以下十部：《无尽意菩

萨经》六卷、《法华三昧经》一卷、《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》四卷、《四天王经》一卷、《普耀经》八卷、《净渡三昧经》一卷、《菩萨瓔珞本业经》二卷、《生经》五卷、《善德优婆塞经》一卷、《阿那含经》二卷。录以补《智严传》之不足。

《出三藏记集》载宝云“译出《新无量寿》，晚出诸经，多云所译。常手持梵本，口宣晋语，华梵兼通，意训允正，云之所定，众咸信服”。此处只具体指出一部经名。《二十五史补编·补宋书艺文志》（聂崇岐撰）载：宝云译经四部：《佛本行经》七卷（《大唐录》作五卷）、《新无量寿经》二卷、《净度三昧经》二卷、《付法藏经》六卷。亦录以补史缺。

据陈士强先生在《佛典精解》中言：“与宝云一起返回的尚有慧达、僧景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有署名‘释昙景撰’的《外国传》五卷。考隋以前并无西行求法并回国的‘昙景’。这里的‘昙景’或许就是‘僧景’。从卷帙的多寡来看，此书的内容是十分翔实的，惜已不存。”陈氏的这一推论，是否可靠，难以结论，只录以备考。

从法显、智严、宝云三人之《传》可以看出，他们的后期活动都与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有密切关系。《佛国记》载智严由乌夷国“返向高昌”，不言到罽宾事。而《智严法师传》载：智严“志欲广求经法，遂周流西域，进到罽宾，遇禅师佛驮跋陀罗，志欲传法中国，乃竭诚要请，跋陀嘉其恳至，遂共东行。”《高僧传·释智严传》言之更详，载智严在罽宾“入摩天陀罗精舍，从佛陀先比丘咨受禅法，渐染三年，功逾十载”。设若智严到高昌未久留，则到罽宾约在402年，在罽宾住三年，约在405年左右同佛驮跋陀罗回

长安，此后不久宝云亦由弗楼沙国回秦地，“还长安，随禅师佛驮跋陀罗受业，修道禅门”。后由于佛驮跋陀罗与鸠摩罗什观点不合（前者弘扬佛教大乘有宗，后者弘扬佛教大乘空宗），受到鸠摩罗什一派排挤。遂与弟子东出潼关南下。智严、宝云当为此次随师东出者。佛驮跋陀罗受慧远之邀，到庐山讲经。义熙九年（413）法显到建康，住道场寺译经。宝云亦在该寺。义熙十一年（415），佛驮跋陀罗来道场寺；十二年，智严应王恢之请，由山东到建康先后在始兴寺、枳园寺译经。在道场寺译经者之中，还有佛驮跋陀罗的弟子慧观。这就是法显所云“就禅师出经律”。自此，原来西行取经的“同契”、“同志”，因智严、佛驮跋陀罗之故，又走到了一起，共同开展译经事业。无疑，他们的再次聚合，对以后的由梵文直接翻译成汉文佛经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。

三

自北魏郦道元以降，法显所著游历之作，名称甚多，今核之诸史籍，约有以下名称：

1. 《佛游天竺记》。见梁僧佑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二、隋法经撰《众经目录》卷六、唐道宣《集神州三藏感通录·梁荆州优填王栴檀像缘二十八》、清《二十五史补编·补晋书艺文志》、唐僧道世撰《法苑珠林》等。

2. 《法显传》。见《水经注》、《隋书·经籍·史部杂传类》、唐智升撰《开元释教录》、唐圆照撰《贞元新定释教目

录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等。

3.《法显行传》。见《隋书·经籍》。

4.《历游天竺记传》。见隋费长房撰《历代三宝记》、唐道宣撰《大唐内典录》、唐道世撰《法苑珠林》、唐智升《开元释教录》、唐圆照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等。

5.《佛国记》。见《隋书·经籍·地理类》、《秘册汇函》、《津逮秘书》、《唐宋丛书》、《增订汉魏丛书》、《学津讨原》、民国江俞经编《历代小说笔记选》、《二十五史补编·补晋书艺文志》等。

6.《释法显游天竺记》。见《后汉书》唐李贤注引。

7.《天竺国记》。见《后汉书》唐李贤注引。

8.《佛游天竺本记》。见唐徐坚等撰《初学记》(《二十五史补编》载为《释法显佛游本记》)。

9.《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》。见金《赵城藏》。

10.《释法明游天竺记》。见唐杜佑《通典》，因避唐中宗李显讳，改“法显”为“法明”。

11.《三十国记》。见明《稗乘》。

12.《高僧法显传》。见1946年《高丽藏本》。

13.《法显记》。见宋《太平御览》。

本世纪所刊印的版本及论著、文章、辞典等工具书中，多称《法显传》或《佛国记》，认为这是同一部书的两个名称。如民国时出版的《历代小说笔记选》中选入的《佛国记》，与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法显传》内容一致。

上列诸书名，究竟是否均为法显所撰，是否就是记述法显西游天竺取经之事，详细校核，疑窦颇多。

(一)作者问题。《水经注》引文称《法显传》为“法显曰”、“法显又曰”，认为是法显所撰《法显传》。宋刻各藏本中，书名“《法显传》一卷”下标有“东晋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”。明僧智旭所撰《阅藏知津》中亦记此书为“东晋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”。看来，法显自撰，历代已作定论。但此定论，似可再探讨之。

南梁僧佑(445~518)所编的《出三藏记集》中所载《法显法师传》，为最早记述法显的传记，成书时间距法显逝世在百年以内。该《传》中并未言及法显自撰游历天竺一事，而在《传》后写道：“其所闻见风俗，则别有记传。”这“别有记传”，是否为法显自撰，不敢臆断。翦伯赞先生主编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》中注：此“别有记传”“就是《法显传》，该书有《佛游天竺记》、《历游天竺记传》、《法显行传》、《佛国记》等名称”。《出三藏记集》中《宝云法师传》最后也言道：“其所造外国，别有记传，征士豫章雷次宗为其传序。”这里的“别有记传”，很可能与《法显法师传》后所言“别有记传”为同一“记传”，即今日所看到这一“记传”。既然已撰有《法显法师传》，这“别有记传”之名称，就不可亦称《法显传》了。如果是自撰，自己是不可能直接书名《法显传》的；且其文体，也非人物传文体。

《佛国记》的最后一段中载：“义熙十二年，岁在寿星。夏安居末，迎法显道人。既至，留共冬斋，因讲集之际，重问游历。其人恭顺，言辄依实。由是先所略者，劝令详载，

显复具叙始末，自云……”从这段《传序》看，像是法显口叙游历经过，由他人记录而成，或者就是雷次宗为之捉笔而成。

雷次宗其人，《宋书》有《传》载：“雷次宗，字仲伦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少入庐山，事沙门释慧远，笃志好学，尤明《三礼》、《毛诗》，隐退不交世务。”元嘉中，“征诣京邑，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，谓之招隐馆，使为皇太子诸王讲《丧服经》。”“二十五年，卒于钟山，时年六十三。”梁《高僧传·释慧远传》亦载：“时远讲《丧服经》，雷次宗、宗炳等并执卷承旨。次宗后别著义疏，首称雷氏。”义熙十二年（416）雷次宗正在庐山从慧远学，时年31岁，“迎法显”，为记录整理法显游历经过，是很有可能的。

（二）《佛国记》可能另有两部。现今各论文、论著，均言《佛国记》即《法显传》，然历史上，《佛国记》可能另有两部。

1. 唐杜佑《通典》卷一九三载：“竺法维《佛国记》云：‘波罗奈国在伽维罗越国南千四百八十里。’”在记叙灵鹫山时，《通典》载：“竺法维《佛国记》云：‘在摩竭提国南，亦天竺属国也。’”《通典》卷一九一《西戎总序》中载：“诸家纂西域事，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，如法明《游天竺记》、支僧《载外国事》、《法盛历诸国传》、道安《西域志》。惟《佛国记》、昙勇《外国传》、智猛《外国传》、支昙谛《乌山铭》、翻经法师《外国传》之类，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，参以他书，则皆纰谬，故多略焉。”卷一九三亦载：“诸家纪天竺国事，多录诸僧法明、道安之流传记，疑皆恢诞不经，不复悉纂